

述的師公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之間相互建構這一結論。

綜上所述，這本書試圖從師公這一特定儀式專家作為實踐的主體出發，通過分析其儀式過程與儀式文本，來闡述師公儀式傳統的承繼與建構，以及師公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的相互建構。作者在本書的導論和不少章節中，多次提到傳統中國文化統一性與地方文化多樣性問題，但並沒有就此展開專門論述，如果本書能夠在上述命題中所有提升，那麼其學術價值將更上一層樓。

杜樹海、鍾琳

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

**丁蕾，《從私藏到公共展覽：民國時期廣州的博物館和展覽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415頁。**

近年來，都市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國內史學家的關注。丁蕾《從私藏到公共展覽：民國時期廣州的博物館和展覽會》一書從民國時期博物館和展覽會中尋找近代都市文化形成的源頭，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嘗試。該書是作者在其導師程美寶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出版，得到廣東省高層次人才項目「全球視野下的嶺南社會與文化」項目的資助。

是書從展覽最基本的元素——「物」出發，回答在近代不同種類的物品如何從私藏走向公共視野，也即「從私藏到公共展覽」的過程。透過分析物品的展示方式及其象徵意義，作者嘗試探討民國時期的公共展覽如何在政府、學者等力量的共同推動下，通過公共展覽建構區域形象。作者認為，重建地域形象的塑造過程，有助於理解近現代中國形象和表述的形成。

在第一、二章，作者回溯了民國時期物品展示的歷史脈絡以及近代西方知識體系傳入後的新趨勢，指出這一時期公共展覽中的「展品」，既有傳統收藏脈絡下的舊物，也有新知識體系帶來的「新物」，諸如民俗物件、考古出土物等。物品能否出現在展覽場上，由其背後的收藏者的學術脈絡以及展覽組織者的社關網絡決定。

第三、四章，以廣州市立博物院、廣州市第一次展覽會和廣東文物展為例，探討公共展覽與地方形象建構的關係。1929年成立的廣州市立博物院是廣州市政府主辦的公共展覽機構，因此其陳列內容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把

持着本地政局的粵籍國民黨元老，透過博物館內物品的陳列與展示表達了他們緊隨孫中山革命道路的觀點以及提高廣州政治地位的企圖。1933年舉辦的廣州市第一次展覽會，以1929年西湖博覽會為參照，是廣州市政府主辦的首次大型展覽會。通過剖析展覽的內容和形式，作者發現：由於此時的廣州政權實際掌握在反蔣集團手中，這次展覽充份展現了地方勢力巧妙地在中央認可的展覽模式下宣揚本地的政治立場，為其地方政權賦予正統性和合法性。1940年舉辦的廣東文物展，雖然不是在廣州舉辦且只局限於「文物」，但作者認為其展品和主辦者大多來自廣州，展示的內容也與廣州市立博物院、1933年廣州市第一次展覽會一脈相承，因此也歸入「廣州」的公共展覽進行討論。在抗日戰爭的背景下，文物展上那些曾經在廣州博物院或廣州市第一次展覽會上展示的「古物」，成為代表廣東文化的「文物」，並被策劃者賦予了「革命」的意涵。

第五章以1940年廣東文物展展出古琴「綠綺臺」為例。明末以降所產生、流傳的肖像繪畫、古琴及拓本，豐富了人們對明末遺民鄭露與綠綺臺琴故事的想像。在這一過程中，鄭露「抱琴殉國」的忠義形象不斷地被豐富、強化，是以民國知識份子能熟練地運用這些能表現鄭露忠義形象且流傳有序的實物，使之成為抗戰期間表達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展現於近代的公共展覽上。

作者在結語中嘗試回答本書的主題——物品從私藏到公共展覽的過程。她指出中國公共展覽不能簡單地套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中國近代「公共領域」具有複雜的相對性與多樣性。其次，公共展覽伴隨着近代國家意識的形成而興起。因此，在通過公共展覽構建中國形象或某一地方形象的過程中，政府起了積極的主導作用。作者透過以一家博物館、兩個重要的公共展覽為個案，比照物品在不同展示空間中的呈現和表述，得出以下結論：「在公共展覽的舞臺上，政府和學者一起推動着物品由私人領域走向大眾，建構和傳播者政治、文化雙重話語下的歷史想像。」(頁289)藉此，作者反思近年學界對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討論，民族形象的構建是如何在傳統文物之外，尋求其它新管道補充。而作者的個案研究發現，從區域研究的角度將有助於理解和認識現當代中國「同一性」的生成。

本書運用的材料主要是廣州市立博物院、1933年廣州市第一次展覽會和1940年廣東文物展三個公共展示活動的檔案、刊物等官方文獻，以及其他大量的資料如方志、文人文集、書畫上的款識、碑銘、報刊雜誌和旅遊小冊子等，在史料的分析與把握方面，頗見作者的功力。作者畢業後供職博物館，

從事文物保護與展覽策劃工作，令作者意識到策劃意圖與展覽實施有着巨大的現實距離，因此對民國時期的「同行」有特別的「同情之理解」。

清末以來，在歐風美雨的影響下，「博覽會」、「展覽會」、「博物館」開始為國人所認識。私藏開始廣泛地參與「公展」，同時，收藏也開始進入公共收藏機構——博物館。不過，規模畢見的「公藏」以及博物館群，恐怕是1949年以後的故事。在缺乏財政支持、收藏政策推行不力以及社會動盪多變等諸因素影響之下，民國時期博物館的建構，大多流於紙上談兵，稍有所成者也未盡完善。但臨時性的公共展覽，尤其是政府主導以外的臨時展覽大行其道。私藏公展無疑是最重要的物品收藏與展示形式，為「前博物館時代」之主流。遺憾的是，作者對這類臨時性的公共展覽關注並不多。其次，在物品方面，作者選取了端硯、南漢花盆拓本、古琴、新美術作品以及新知識體系下產生的民俗物品和考古遺物等，新、舊皆有兼顧。傳統「私藏」以書畫、陶瓷、金石為最，然而書對這幾類「舊物」在近代如何被重新分類、鑒別、挑選與展示尚欠缺深入的研究。

總體而言，中國博物館館史的寫作寥寥可數，關於廣東地區的博物館館史的寫作尤為匱乏，是書的出版無疑極大地補充了這一領域的不足。最近徐堅出版的《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提出要將中國博物館研究從收藏史向思想史轉變。而丁蕾則從展品的來源、展覽的實際運作出發，討論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象之形成。這也許就是博物館人寫博物館史的特點。展覽策劃與實施常常屈從於藏品的構成以及參與其中的各種權力關係，以致策展初衷與展覽實施並不完全對等。因此，「思想」固然重要，但「收藏」同樣重要。

黎麗明

廣州藝術博物院陳列研究部

**劉永華主編，《儀式文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236頁。**

在中國宗教研究中，我們看到的儀式展演很多時候會用到大量的儀式文獻。這些文字有的是口頭傳誦（如師公唱本），有的是跟書唱讀（如道士科儀本）；有的是用漢文傳抄，有的是用少數民族的文字傳抄（如彝族畢摩用